

· 国防科技大学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

主 编 · 刘戟锋 刘 晶 ·

丰建泉 王 忠 著

Researches in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ree Kingdom Period

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Researches in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ree Kingdom Period

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

丰建泉 王 忠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丰建泉,王忠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649-0375-6

I. ①三… II. ①丰…②王… III. ①军事情报
—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 ①E293.6②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1584 号

责任编辑 程若春

责任校对 李 欣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4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三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史书《三国志》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少有从军事情报角度出发研究三国历史者,本书即是以情报的视角考察三国历史,作一番大胆的尝试。

三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深刻地影响了战争实践,分裂和统一的战争和鼎峙争霸成为时代的主题。频繁激烈的军事斗争、复杂多变的战略环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背景,将三国时期的情报活动和情报思想推向先秦之后的又一高峰。三国时期情报的内涵丰富,基本涵盖了现代除高科技情报之外的所有情报。三国时期的情报活动也极具特色,侦察获取手段多种多样,情报分析洞察细虑,传递方法快速高效,情报技术简捷实用,情报机构初步建立,反情报活动积极有效,总体上呈现出战略性、谋略性和预见性的特点。三国时期的情报思想全面而深远,产生了像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郭嘉、荀彧、司马懿、周瑜等流芳后世的情报家,他们全面客观的情报获取思想、高屋建瓴的战略分析思想、纵横捭阖的联盟分析思想、灵活多变的情报欺骗思想、高瞻远瞩的情报队伍建设思想,留给我们很多深刻的思考,对当代情报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章采用史学的实证法和对比法,本着“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原则,综合研究三国时期的情报实践和情报思想等若干问题。全文

共分七部分:引言部分阐释了三国时期历史分期标准和若干概念与当代理论的区别,指明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国内外三国研究的基本现状,明确了主要参考文献、研究目的与方法等基本写作思路,提出了本课题的主要创新所在。第一章着力介绍三国时期情报活动产生的背景,阐明这时的情报实践与思想水平达到了先秦以来的又一高峰,暗合了人类情报发展史曲折发展的理论。第二章提出三国时期情报的内涵,并运用当时的情报理论和古代兵学思想从五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第三章从情报活动的各环节入手,对三国史籍中大量情报史料进行分类爬梳,总结归纳出三国时期情报实践的特点。第四章以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为切入点,重点考察情报活动对战争成败和战略态势的影响。第五章以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从情报获取、情报分析、情报斗争、队伍建设的角度管窥三国时期灿烂的情报思想。文章最后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提出三国时期的统帅和将领极为重视情报和情报活动的结论,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对当代情报工作的若干启示。总体来说,文章从多部史籍中精选了近百个情报史实并附以详细出处,结合情报理论以三国情报的内涵和情报活动的特点为“面”,以三大战役中的情报活动为“线”,以主要情报人物的情报思想为“理”进行论述,力求为专家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三国时期情报活动作一番有益的探索。

作者

2010年9月

序 言

丰建泉博士是国防科技大学英语专业的资深专家,多年来一直勤恳地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成绩颇为突出,获得了各方好评。200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毅然前往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在这一全新领域,他克服种种困难从头学起,虚心向前辈专家和学界同仁请教,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资料,刻苦钻研,拼搏进取,圆满地完成了学业。

作为他的师长,我十分赞赏他的毅力和定力,也完全相信以他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异的学术修养,在军事情报学科领域一定能够有所作为。短短三年间,丰博士已在军事学核心期刊和其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最近又喜闻他的军事学专著即将出版,我甚感欣慰。

丰博士在《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一书中,以三国时期的斗争历史为背景,以军事情报问题为主线,从情报人物和情报战例两方面入手研究三国情报史,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的精髓和要旨——即战略情报分析与研究。此书运用考据、实证、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和梳理了主要情报人物的情报思想,研究了主要战役中情报活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启示和建议,在彰显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情报活动独特形态的同时,揭示出我国古代情报活动和情报思想的生命力。我对这一时期的军事问题也有所了解,饶有兴趣地读罢此书后,认为值得肯定之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选题精准。三国时期是我国军事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

史时期,海内外对三国军事史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很多非常成熟和完善的理论成果。但在军事情报史研究领域,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因此,此书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我国情报发展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丰富和深化情报理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视角,拓展了新的领域。二是切中精髓。三国时期情报活动在手段、技术和装备上,较当今情报工作不知要落后多少,这一时期情报问题的精髓和要旨,正是战略情报分析和研究;突出的表现就是具有极强的预见性。此书能够将战略情报分析、大战略、软实力等当代情报理论和战略思想与顺天应时、天人合一、缓而后争等我国传统兵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归纳总结出一系列战略情报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并贯穿此书的始终,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书中对诸葛亮战略情报分析失误的理论阐述,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作者再次强调战略情报分析对战争甚至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我对此十分欣赏,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祠一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中“审势”应当是书中所说的战略情报分析。三是论据翔实。此书在选材上坚持以《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正史为依据,从中爬梳出能够反映三国时期情报活动与情报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指出了历史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与史不符的情报故事,参考了后世三国研究学者的著作与论文,做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具有基础性价值。四是古为今用。我们常说,不知道历史就不能深刻地认识现在,更无法准确地预见未来。此书没有沉溺于单纯历史研究的窠臼,而是从情报斗争史中探索情报与战争和战略的关系,找准三国时期情报实践与理论的生命力所在,结合当代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提出对情报工作的一些启示,对当代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也显示出作者对三国时期情报实践和理论的价值有着较为深入的新思考。

三国情报史是斗争激烈、谋略迭出、人才济济的历史,三国情报史研究是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此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我国军事情报史研究的一段空白,能够为广大学者和军事爱好者研究和了解三国情报史提供很好的指引。另外,三国情报史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何在今天继承这份财富,如何在国际竞争与

合作、国家富强与发展、军事斗争与准备中正确运用这份财富，此书也会为我们提供新的启迪。

丰子宙

2010年10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三国时期情报实践与思想的大发展	(25)
第一节 汉末的落后状况	(25)
第二节 大发展的条件	(27)
第三节 大发展的表现	(31)
第二章 三国时期情报的内涵	(36)
第一节 敌之形势	(37)
第二节 进退之道	(41)
第三节 国之虚实	(44)
第四节 天时人事	(48)
第五节 山川险阻	(52)
第三章 三国时期情报活动的特点	(56)
第一节 多种多样的获取手段	(56)
第二节 洞察细滤的分析活动	(65)
第三节 快速高效的传递方法	(71)
第四节 初步建立的情报机构	(77)
第五节 简捷实用的情报技术	(80)
第六节 积极有效的反情报手段	(84)
第四章 主要战役中的情报活动	(90)

第一节 官渡之战中的情报活动·····	(91)
第二节 赤壁之战中的情报活动·····	(103)
第三节 夷陵之战中的情报活动·····	(116)
第五章 三国时期的情报思想·····	(127)
第一节 曹操的情报思想·····	(128)
第二节 诸葛亮的情报思想·····	(139)
第三节 孙权的情报思想·····	(150)
结论与启示·····	(155)
一、坚持以情报为决策的基本依据·····	(156)
二、用大战略和大情报观指导情报工作·····	(160)
三、处理好情报工作中的几组关系·····	(162)
四、加强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	(166)
五、注重情报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167)
附图·····	(171)
参考文献·····	(177)
后记·····	(183)

引言

一、概念阐释

(一) 对三国历史分期的思考

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是东汉与西晋之间一段分裂对峙时期,因有曹魏(魏国)、蜀汉(蜀国)、东吴(吴国)三个政权,呈鼎足之势分据一方而得名。关于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问题,目前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综观各家之言,对三国时期的迄止时间基本上没有多少分歧,都认为应当以 280 年(标志:晋武帝多路发军灭吴)为划分三国与西晋的时间点。问题在于三国的起始时间各方认识不一,主要存在 220 年(标志:曹丕称帝)、184 年(标志:黄巾起义)、190 年(标志:义军讨董^①)、208 年(标志:赤壁之战)起始说等四种观点。

这四种观点各有其道理,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内出版的各种年表、历史著作和辞书,多采用 220 年起始说。^②严格说来,三国并存

^① 东汉灵帝时,朝廷宦官与外戚争权,大将军何进私召西凉军阀董卓入京以诛宦官。189 年董卓引兵驰抵京城后,废少帝立献帝,虐刑滥罚,放纵士兵在京城中大肆抢劫财物,淫掠妇女,以致京城百姓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190 年,冀州牧韩馥与袁绍、孙坚等人联合各路军阀举义兵讨伐董卓,是为“义军讨董”或“关东诸侯讨董”。

^② 任昭坤. 关于三国历史分期的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 2001(6):131.

的时间段的确应划定在自 220 年曹丕称帝始至 263 年魏灭蜀止,共约 44 年的历史期间之内。但魏、蜀、吴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则在三国正式建立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在蜀灭亡后到 280 年晋灭吴这段时期,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是时代特点等都与三国鼎立时具有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如在绝大多数学术著作和老百姓的心目中,曹操(155 年~220 年)、周瑜(175 年~210 年)等都是三国人物,隆中对(207 年)、官渡之战(200 年)、赤壁之战当属三国战略与战例,而采用这种分期方法即是将这些人物、事件和谋略归入东汉,难免造成历史分期与学术著作中的史实不相符的矛盾。因此,学术研究不必太过机械地拘泥于帝王年号,而应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统一性出发,从那个时代的特点出发,全面、灵活地划定三国时期。

近年来国内很多魏晋史专家学者(如何兹全、马植杰、柳春藩、张大可、余大吉等)普遍采用了 190 年起始说,柳春藩在《三国史话》中明确提出三国时期与三国正式建立是不同的,他认为“三国的历史共 90 年,从 190 年军阀混战开始,到 280 年晋灭吴统一南方为止。但三国正式建立的时间,则是从 220 年曹丕称帝开始的。”^①事实上,即使先前不采用此说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在三国研究论著中涉及了 190 年至 220 年之间的历史,概莫能外。本书即选用当前较为普遍的观点,将三国时期限定在 190 年到 280 年共 90 年间。其中包括三国正式建立前的 30 年军阀混战时期和蜀国灭亡后的魏吴、晋吴对峙时期,这样才能对三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才能在整个三国军事史的发展中更全面地认识当时的情报活动与思想理论。

(二) 对三国时期国家的认识

在汉语中,“国家”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和《尚书》。《周易·系辞下》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立政》有言:“继自今立政,其以俭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国家。”“国家”最初由“国”与“家”两个概念所合成,先秦时期,称天子所治曰“天下”,诸侯所治曰“国”或“邦”,卿大夫所治曰“家”,“天子建

^① 柳春藩. 三国史话.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1.

国,诸侯立家”^①,即“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②这里的“国家”显然偏重于疆域及其民众,还不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春秋时期,这个词已经合用,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③即“天下国家”已经成为人们的常用语,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则在于个人。后来,家的概念演化为家庭,“国家”一词被沿用下来,用来表征一种地域民族单位和社会政治单位。

三国时期的国也有着—个发展和过渡的过程。先是曹操、刘备和孙权于216年、219年、222年分别称王,然后曹丕、刘备和孙权于220年、221年和229年分别称帝,最后于263年魏灭蜀、265年晋代魏、280年晋灭吴。可以说,最初的魏、蜀、吴三国基本类似于诸侯国,他们都在同一旗帜下,对民族、文化和信仰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对于其他两个实体只认同他们是地方割据、军阀势力,而缺少现代国家的“外国”感。称帝后的三国和晋才正式建立了国号,完善了政治体制,真正拥有了“天下国家”的属性。但严格说来,这时的三国与诸侯国和现代国家仍有区别:(1)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有个“天下共主”——周天子,尽管后期周天子只是傀儡,但各诸侯国即使再强大,也只是臣下,在名义等级上并没有逾越;而三国中后期,三个政权都认为自己—是中原帝国的正统,以正统的继任者自居,并不认为自己与其他两个实体是“平等”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消灭与被消灭、统一与被统一的关系。(2)现代国家都宣称自己是独立的,与其他国家互不统属,更不承认与其他国家同属于一个—国家,而且与其他国家不重叠(一些有争议的地区等除外);而三国正式建立之后虽然各自国号不同,但他们对华夏民族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都以中原帝国正统继任者自居,也就是在同一旗帜、信仰下的不同政治、军事实体。吴蜀不断的北伐和魏灭蜀、晋灭吴就是明证。

认识到三国与现代国家性质的不同,就可以知道三国之间的情报

① 杨柏峻.春秋左传注·桓公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94.

② 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493.

③ 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上.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493.

活动是以中国古代激烈的统一战争为背景的,是华夏民族内部的情报斗争。也正因为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共通性非常之大,使得三国时期的情报活动更为精彩,情报思想更为深远。

(三) 三国的“情”与近代情报的区别

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对情报下一个统一且被广泛认可的定义。这是因为人们看待情报的角度不同,对情报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的侧重于情报的军事含义,类似于军事情报;有的侧重于情报的知识性,类似于信息;有的侧重于情报产生的过程,类似于情报工作或情报活动。

克劳塞维茨认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①。我国首版《辞源》(1915年版)给出的解释是:“军中集种种报告,并予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我国首版《辞海》(1939年版)的定义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修订版《辞海》(1965年版)对情报的定义有所发展:“对敌情和其他有关的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报报导。”甚至有语源学家认为“情报”本身就是日源词汇,于19世纪从日本传入我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汉语外来词词典》就采用了这一观点,将“情报”一词收录其中。“情报”在日语中是信息、资讯、消息的意思,如果情报确实来自日语的“情报”,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在我国古代没有情报这一词汇。(2)在19世纪的中国,情报大凡也是信息之意。

当代军事情报理论对军事情报所下的定义是:“为保障军事斗争的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这是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定下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②虽然目前情报理论界对情报、军事情报定义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深入探讨,但所有观点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认同情报是一种信息,军事情报是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获取的信息。

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三国时期情报

^①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3.

^② 许果复等编. 军事情报学概论.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88. 14.

活动很频繁,很多优秀的谋略家和军事将领继承了先秦兵家对情报获取、分析、运用的基本理论,又经过汉末军阀混战的实践考验,无不重视在战争中积极获取对己方有利的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但史料中没有当代“情报”或“军事情报”的明确提法,而代之以“情”、“虚实”、“形势”、“动静”等来表示。

“情”是我国古代表示情报的最常用说法,兵书中用“情”表示情报意义的更是比比皆是。如《孙子兵法·用间篇》谈到敌情的重要性时说“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又谈到正确的情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再如《六韬·龙韬·王翼》指出“耳目”的作用是“览四方之士,军中之情”^①。《三略》中“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②句更明确提出“敌情”这一说法。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三国时期沿袭了这一说法。如223年魏文帝曹丕在诏书中为其讨伐孙权无果退兵进行解释:“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③意思是说,以前武王伐纣和汉光武帝征隗嚣都是即将得胜时缓军回撤,这是顺应天时并充分考虑所获敌人情报后作出的慎重决定。又如董卓入洛阳篡权时,非常信任尚书周毖和城门校尉伍琼,任命他们举荐的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人任州郡地方长官。而韩馥等人赴任以后都率领当地武装讨伐董卓。董卓听说这一情况以后,“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④。这里的“通情卖己”即是向敌方泄露己方情报之意,其中的“情”与当代“情报”在信息功能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除了“情”这种说法外,三国时期还用“虚实”、“形势”、“动静”等表示情报之意。

官渡之战初期,荆州牧刘表试图凭借长江天险保持中立,坐观曹操袁绍之成败。但曹操这时已迎立天子迁都许昌^⑤,刘表帐下从事中郎

① 徐培根. 太公六韬今注今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220.

② 魏汝霖. 黄石公三略今注今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37.

③ 陈寿. 三国志·文帝纪. 裴松之注引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1959. 83.

④ 陈寿.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5.

⑤ 今河南许昌。

韩嵩、别驾刘先和大将蒯越都劝他投靠曹操。刘表为了准确获知最新的战略动态,了解北方地区详细的战略情报,于是计划派遣一名间谍作为特使,以向朝廷进贡的名义去许都,打探曹操集团内部社会、军备、人心等方面的战略情报。经过周密考虑,最后决定“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临行前嘱咐韩嵩说:“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曹公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釁。”^①釁本意为杀牲,用其血涂于器物缝隙中祭祀,此处用其转借义作缝隙、裂痕之意。在此,刘表实际上当面向韩嵩下达的情报搜集任务:“当今的战略环境比较复杂,曹操拥立天子建都许县,你去为我调查一下曹操的实力。”韩嵩根据刘表的部署赴许都拜见了天子,利用机会接近曹操和他身边的人,并走进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中实地调查。曹操也深知韩嵩肩负着特殊使命,为了博得韩嵩的好感,拉拢刘表作为自己的后援,曹操上表天子拜韩嵩为侍中,迁零陵^②太守。韩嵩回到荆州以后,向刘表“称朝廷、曹公之德”,认为曹操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优势,政治上“挟天子而令诸侯”^③,与其他军阀势力相比其治地经济较为繁荣,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好,曹操本人文治武功令人钦佩,麾下又有一班能臣良将忠心辅佐,一定会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并极力规劝刘表投靠曹操,以至于多疑的刘表怀疑韩嵩被曹操发展为“反间”,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在严刑拷打韩嵩的随员依然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刘表将韩嵩长期关押起来。从韩嵩担负的任务、实施方法、所获情况的具体内容来看,此处的“虚实”实际上就是当代情报内容中的战略情报,韩嵩实为具有特使身份的战略间谍。

在219年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之战中,曹军汉中地区主将夏侯渊被蜀将黄忠斩杀,其副将张郃及残部陷入刘备的重重包围之中,曹操亲自率军自长安来救。由于曹军之前袭取汉中时走的散关、沮道已遭蜀军

① 陈寿.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裴松之注引傅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3.

② 今湖南永州。

③ 语出《三国志·董二袁刘传》中沮授向袁绍提出的发展战略和《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曹操集团的提法是“奉天子以令天下”(语出《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或“奉天子以令不臣”(语出《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封锁,只得取从未走过的褒斜道进入汉中。褒斜道是穿越秦岭中部连接关中与汉中的三条谷道之一,沿褒水和斜水河谷曲折而行,河谷深险,悬崖壁立,部队通行极为不易,故历代多治栈道于褒斜道。曹操急于了解该谷道的相关情报,于是派遣其后期重要谋士、丞相主簿贾逵率领侦察分队先期抵达斜谷“观形势”^①,其任务就是获取褒斜道的军事地理、社会情况和蜀军防御等重要情报,并担任后续部队的警戒分队。由于贾逵此次完成侦察与警戒任务较好,使得曹军主力部队行进极为顺利,刘备亲率蜀军也没有找到发动突袭的机会或其他有利战机,只得收拢兵力,扼守险要,坚壁不战。曹操这次进军虽然没有夺回汉中,但顺利接应了张郃的部队,曹军得以全师返回西安。在此,贾逵执行的任务与当代军事侦察中先遣侦察和行军侦察的目的和实施方法十分相似,所谓“形势”实乃包括战场及行军路线的地形、水文、社会情况等战术情报,以及关系到曹军生死存亡的战略性情报。

《三国志》还记载了很多情报在边防部队戍边作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此时一般用“动静”来指代情报。如东吴名将孙韶在吴国北部边境任边将数十年,其镇守的淮泗一带^②在他任内非常安定,很多魏国腹地的百姓都慕名而来归附他,以至于魏国淮南沿江边境守将被迫撤军迁民,魏国边境数百里无人烟。长期的边防作战经验使他非常重视获取敌方的相关情报。由于他“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先知动静而为之备,故鲜有负败”^③。“务”在古汉语中用作“事务”意时一般指重要的、紧要的事务。上文意思是说孙韶认识到侦察与情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加强边疆的日常警戒和积极派遣侦察人员作为最紧要的军务,每次敌人有军事行动时都可以先获得相应的情报而提前做好准备,因此他很少打过败仗。由此可见,“动静”在当代情报理论中应指能够反映敌人发动战争和突然袭击征候的战略预警情报,只是由于时代主题的不同,处于历史大动荡的三国时期其战略预警情报更加频繁和普遍,大

① 陈寿. 三国志·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81.

② 今淮河下游地区。

③ 陈寿. 三国志·宗室传.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216.